

外国 文坛

AIGUO

4

广州外国语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文化室

ENTAN

目 录

中外文化交流

- 卫礼贤对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建树 魏家国 (1)
- 库恩与中国古典小说 林 茹 (14)
- 考证“椿”字 话说山茶 谢联发 (26)
- 浅谈俄苏文学对蒲风的影响 罗可群 (32)

文化理论

- 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彭守诚 (39)

诗歌与诗人

- 魁北克新诗的国家主题及代表诗人 程依荣 (47)
- 心灵扭曲的群像 毛思慧 (58)
- 当代西澳与当代西澳诗人 巢 圣 (71)

戏剧与剧作家

- 语言之外的艺术 王 虹 (75)
- 从《M. 玛格达莲娜》一剧试析
黑贝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王 晖 (82)
- 布莱希特和他的《灰阑记》 陈建芳 (98)

小说评介

- 一部极其有趣的奇书 张孝国 (102)

评伦茨的《激流中的人》	梁定祥 (114)
谁之罪	何春明 (119)
自由解放的悲壮颂歌	徐真华 (127)
神秘之上添神秘	陈家基 (131)

文学史研究

德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外国影响	马桂琪 (136)
古代两河流域的神话故事	王 钢 (150)

文学教学

对毕业班文学课教学的一些建议 ...	Anke Pieper (178)
--------------------	-------------------

翻译园地

荞麦米饭 ... (俄) 谢尔盖·秋秋尼克 陈楚祥译	(183)
传染病 ... (俄) 谢尔盖·秋秋尼克 陈楚祥译	(186)
记性好的人	(德) 梁菁远译 (191)
汉娜	(德) 何 西译 (195)

比希纳和比希纳文学奖	蔡献涛 (200)
现存马克思最早的一篇诗歌小作	马 路 (206)

马桂琪

编者的话

卫礼贤对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建树

魏 家 国

一、卫礼贤在中国

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于 1899 年来中国青岛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他出身于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奉派来华的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直接与间接参与了侵华活动。卫礼贤来到刚被德帝国主义强占的青岛担任“圣职“,正赶上义和团高举反帝大旗。卫礼贤由于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他目睹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表同情。他认为,中国人民只要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就会是世界上最友善、最诚实和最可爱的人民。面对中国北方风起云涌的义和团,他与帝国主义者持以异议,他认为这是“真正民族精神的振奋”。因而对八国联军的行为,他认为是侵略,是野蛮行为,应予谴责。由此可见,卫礼贤是一名与众不同的传教士。

就宗教而言,卫礼贤最终处于否定之中,他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研究中国的科学事业中,他虽没有放弃传教,可是传播的内容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传播的是他信奉孔子所主张的“仁爱”。在他 1927 年发表的《人是准则和中心》一文中,他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文化精神的崩溃,文中甚至还出现了与一些神学家所迥然不同的说法:

“我不得不公开地声称：上帝是死的。人们曾对我们说，上帝是善良万能的主和父亲，可是，上帝并不能用好的良知说明自己的真实存在，据我们的经验，没有一种辩证艺术能够使我们相信：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博爱和万能的上帝。人，是神灵的最高代表，人的身上拥有一切力量，人就是准则和中心，在人身上有着血液在不断循环，以维持生命，这才是神，此外，就不再有什么神了。”^①

由此可以看出，这位早年的传教士，神学家对上帝与人的看法，他的思想认识的升华却是令人玩味的。无怪乎他晚年时骄傲地说，他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从未给任何中国人进行过洗礼，自己反倒成了忠实的孔教徒，成了一个中国文化迷。

卫礼贤从 1899 至 1920 年第一次在青岛逗留了二十二年之久。1922 年再度来华，任德国驻华使馆科学顾问，同时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教授。1924 年底他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中国，离开了他的精神故乡青岛，他先后两次在中国，度过了二十五年之久。他有生之年差不多一半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青岛是这位大汉学家成长的摇篮，他的汉学成就与这个城市密不可分。他来到青岛的第二年就开始热心办学，他办的“礼贤书院”名声远扬，慕名远道来书院就学的达四五百人，来自十余省。他在青岛办学取得的成绩，曾得到清政府的奖赏。他在热心办学的同时，特别勤奋治学。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学会了说和读，而且对我国古老文化产生了很大兴趣。特别重视研读儒学。他说“西方圣人是德国康德，东方圣人则是中国孔子”，他成了孔子的忠实信徒。他写的《孔子》一书，论述翔实，并有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他在

汉学研究方面，功力之深。

他与中国学者交往，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他与避居青岛的青廷遗老过往甚密，他对这一批“青岛的老年人”优礼欢迎。他非常感谢这些正在湮没的旧文化的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通向中国智慧的大门并没有给这位进行科学研究的汉学家从外部打开，而是从内部打开。^②在这些人中就有清政府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著名学者劳乃宣。卫礼贤对他特别敬重，从他那儿得益匪浅。卫礼贤还在青岛建立尊孔文社，为保存中国典籍做了许多工作。

二、翻译与研究

卫礼贤胸怀大志，矢志于沟通中西文化。他勤于译著，曾把《论语》、《道德经》、《孟子》、《中庸》、《易经》、《吕氏春秋》和《中国哲学》等译成德文。他的翻译涉及的范围甚广，除古代典籍外，他的译笔还触及中国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他把中国历代山水抒情诗及部分散文，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苏东坡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译成德文，书名叫《中德四季辰光吟咏》，这一书名颇易使人误解为歌德之诗，但若仔细研究，就会知道是受歌德那首诗的影响而取名的。尽管它与歌德创作的那首诗性质不同，但也颇为令人玩味。卫礼贤崇敬歌德，可说是贯串在他的一生中。关于歌德，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胆地拿他去和老子相比。他认为中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中德之间关系是最容易联系起来的，至少可以间接溯源于歌德的影响。1923年正当他第二次在中国逗留期间，适逢歌德逝世九十周年之际，歌德就已在中国广大的知识界享有声誉。不多几年后，在歌德《百美新咏》译

本(1927)和《中德四季辰光吟咏》(1830)发表一百周年来到或即将来到时,卫礼贤还曾试图在德国再次论说架设中德文化桥梁的问题。^⑤

关于卫礼贤翻译的特点,这里举出一例,当可知其端倪。

歌德译过一首关于梅妃的诗。梅妃曾是唐明皇最宠爱的妃子,诗才敏捷,容貌出众。可是杨太真进宫以后,唐明皇就让梅妃居于冷宫。一天,外国进贡宝珠,唐明皇忽然想起梅妃,令人把宝珠赠她,她却将宝珠退还,并附诗一首:

柳叶蛾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这首诗除了汤姆斯英译和歌德转译成德文外,卫礼贤后来也把它译成德文。现将歌德和卫礼贤二人译诗抄列于后,试比较二者翻译的特点。

歌德:

Du sendest Schätze, mich zu schmücken!

Den Spiegel hab' ich längst nicht angeblickt;

Seit ich entfernt von deinen Blicken,

Weil ich nicht mehr, was ziert und schmückt.

卫礼贤:

Die kassablätter — Augenbrauen habe ich lange nicht geschmalt.

Schminkreste und Tränen feuchten die rote Seide.

Den ganzen Tag wasche und kämme ich mich nicht.

Warum sollen nun Perlen und Edelsteine meine Einsamkeit trösten?^⑥

评论这两首译诗，首先涉及到“意译”和“真译”两种译法，翻译界的这一纷争目前尚无定论，这里先从他们二人的翻译特点谈起。

诗人歌德在翻译诗时，重视的是艺术价值，他在深刻理解原诗后，借助于自己的想像力，要赋予译诗以新意，因而他避免用德国人不熟悉的词汇，而完全采用大家所熟悉的德文表达方式。他没有描写任何装饰，只刻划梅妃的精神状态，尽情反映她的内心世界，无意于外形描述。这样一来，这首诗就德国化了。歌德这种重“神似”而轻“形似”的译法，自有其独到之处。

卫礼贤是一位学者，他从学者的角度翻译这首诗，无疑，忠于原文是重要前提。因而他的诗基本上符合原文，没有走失原意。他要尽力保持诗的原有丰采。真不愧是一位熟悉中国的大汉学家，一位著名的学者。对照原文，自会感到译诗达意真切。因此，和歌德的译诗相比，各有千秋。不过就翻译而言，笔者认为：卫诗朴实求真，富于中国风情。歌德译诗流畅自然，德化有余，汉味无存。既为翻译，理应两者兼顾，应当考虑德化，但也不能把汉味置之度外。

此外，卫礼贤在1921年还译了一本《中国民间童话故事集》，这本故事集不仅收集了中国一些童话，而且更多的是寓言和民间故事，鬼怪故事和神话，所以也有人把它说成《中国神话故事集》。这本故事集很有价值。他是从许多小说杂记，或民间传说中选译的，有好多民间故事是他亲耳听见、亲笔记下的，他所利用的书籍有《三国志》、《史记》、《聊斋志异》、《西游记》、《今古奇观》、《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等，由此可见卫礼贤翻译范围涉猎之广，也可发现他对内容丰富

的中国小说故事的兴趣，特别是神话小说。^⑤在他的这本书中收集了《猴王孙悟空》，虽只是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开头的一部分，但这段猴王出世，大闹天空，可谓妙趣横生，脍炙人口。这一部分确实较难翻译，可是阅读译文后，深感译笔流畅，忠于原文，几乎没有什么漏译或避难就易之弊。可以说译文保留了原文丰采，富有东方情趣。读起来，译文如行云流水，自不用说，就对原文理解深透而言，亦叹为观止。特别是他翻译态度之严谨，更令人崇敬。对比德国古今众多的翻译家，对卫礼贤之敬意不禁油然而增。

卫礼贤还译了《蝴蝶梦》和《劈棺》两个剧本，其内容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告诉人们，要努力去寻找绝对真理。此外，他还译有中国滑稽戏《假新郎》，可惜他只译了一半。

特别要提及的是，他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如前所述，得益于劳乃宣等的帮助。他的《易经》翻译和研究，在欧洲堪称首屈一指，1920年回国他已是一位名不虚传的大汉学家了，就连德国学术界一些资历颇深、德高望重的汉学家也莫不对他深表敬意。《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个特别位置，几乎从中国文化开始起就有了《易经》，它不仅包括儒家和道家学说，而且还包括中国的各种学说，它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是巨大的。《易经》里还含有当今人们所谈的自然和历史辩证法。此外，它还有一些超越时代的东西，卫礼贤当时要理解与翻译这部著作绝非易事，可是，劳乃宣等青岛的老人们帮助他弄懂了《易经》的内容实质。

随着他的翻译事业的进展，他的研究也获得了卓越成就，这些研究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但由于时代的变迁，研究成果几乎一直未被利用。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儒家和道家，还

谈到中国的其它方面。他写的有关《易经》的文章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些文章阐明了这本书的复杂体系。在他生前没有一篇文章谈到《易经》，在他死后也只有寥寥几篇文章——其中包括他的儿子赫尔摩特(Hellmut Wilhelm)所写的文章——指出《易经》是一本有用的书，是一本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事情方法论的教科书，在中国，人们很早就对它持这样的看法了。^⑨

卫礼贤的翻译造诣之深，贡献之大，在德国可谓有口皆碑，堪称楷模，寥若晨星。然而他除了作为翻译家介绍中国文化外，更重要的是一名学者，大汉学家，他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作品有：《孔子》、《中国之灵魂》、《中国文学史》、《孔子在人类代表中的地位》、《孔子和儒家学说》、《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歌德和老子》、《东方的智慧》和《中国的人生哲学》等，有些书在欧洲被译成英文、法文等好几种文学。

三、对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建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继十七、十八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之后，再一次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只不过稍早一些时候在更加汹涌澎湃的“西学东渐”热潮掩盖下，不那么被人们所注目罢了。这个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中学西播”的工作进展很好，在传播中国文化中，卫礼贤却是非常突出。

1924年卫礼贤回到德国后，曾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现在，我必须从遥远的中国进入到整个现实的、狭隘的、肮脏的、活跃而动荡的欧洲，向浑浊的洪流中游去。如果东方人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能游过欧洲的洪流，那就遗憾了。而

我认为，它是有力量游过去的，因此，我要冲进这浑浊的洪流中，不借助于魔法，凭依的就是中国活力。要焚毁所有船只，要游水就得让自己长上脚蹼，我要用脚蹼遨游于生命的大海。”他一回到德国，就到各地去作报告，很快他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要在他的祖国确定一个永久性的活动场所。后来，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授予了他荣誉哲学博士，此外，还聘任他为汉学教授。在他迁往法兰克福后，卫礼贤为筹建“中国学院”四处奔走。这座学院的任务是沟通东西方文化，学院要成为留学生的活动中心。法兰克福的第一所“中国学院”充分显示了卫礼贤在德国的工作高潮。可以说，这是“集他许多年之前开始了的中国事业之大成”。随后七年，他一直任该院领导，直到后来他疾病缠身，仍集中全力，坚持工作，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发挥了一个作家惊人的创造性，而且向无数德国城市的热心听众作了一个又一个报告。他在大大小小范围内的谈话是那么引人入胜，风趣幽默，对所有的人是那么亲切，平易近人。笑谈中说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话语。他爽朗而又落落大方。他毅力坚强，热心工作，勤勤恳恳。^⑦他为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不遗余力，为促进中德人民相互了解，为中学西播，为中西文化交流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心。他在短暂的十年内（1921—1930），为彻底改变德国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而奋斗着。中国学院分院相继在慕尼黑宣告成立。中国学院在德国建立了，可是人们并不完全知道，当初为建院而筹措资金是一件多么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试想，如果没有他的组织天才，没有他的才能和工作艺术，建院只能是一种设想，永远也不会成功。这所学院后来产生那么大影响，在不

多几年内切切实实地在德意志国土上唤起人们对中国的激情，到他死后，才证明他的工作完善和伟大。

当时，汉学在德国还非常年青。第一个汉语教研组是1909年在汉堡大学建立的。1912年在柏林建立了德国第二个汉语教研组。后来，德国的汉学逐步地普及与发展着，这与卫礼贤积极精神的鼓舞是有一定关系的，整个德国教育界都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深表敬意。

当时，显赫的大汉学家保罗·彼里峨特（Paul Pelliot）著文赞赏卫礼贤的事业。卡尔·赫兹（Carl Hetze）这位中国问题的杰出科学家，在给卫礼贤所作的悼词中，说道：“他的最后一批著作的高贵质量使批评家们无话可说，我们多么希望他当时能为我们留下更多更多的笔墨。”

他的语言使一些科学工作者惊呆了。正是他的语言使一个动荡时代的人们都着了迷。瑞士大心理学家容克（C·G·Jung）在卫礼贤死前不久才认识他，是他的《易经》译本吸引着他，他在《易经》的插图中看到一个藏着挪亚方舟式的宝库，使他感动的特别是语言。他在一个纪念会上说：“他的语言透露出通俗的伟大真理，朴素而深刻的含义，它给我们送来金色花朵的阵阵幽香，温柔地给欧洲大地植入了一棵嫩芽。”容克不仅把卫礼贤看作为研究中国的科学家，而且还赞许他是东西方之间桥梁的桥墩。这座桥墩有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它触及异国文化的表面和内部。

一些钦佩卫礼贤的人把他身上清晰体现的中国东西看作是欧洲的东西，而卫礼贤显然是一位深受过东方文化熏陶的德国大汉学家。^⑧

卫礼贤的业绩是伟大的，仅就他的系列丛书《中国丛

书》的出版，据赫尔曼·黑塞的看法，是欧洲本世纪前三十年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这应归功于卫礼贤，有人说，中西精神、中德两国的伟大人道主义传统和谐地融合在他的身上。因此，德国人送给他一个雅号，称他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⑩ 这该是一件多么意味深长的事！

他使人们确信，欧洲本身需要东方的哲学，东方哲学的影响能够改变欧洲人的生活，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然活生生地保存在欧洲人的精神世界里。

卫礼贤于 1930 年告别人世后，尽管一些出色的汉学家要接替他，领导这所中国学院，但这所学院几乎一夜之间在公众心目中就失去了它的光辉和力量。

四、卫礼贤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卫礼贤有两个儿子，两人像他父亲一样，都曾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除了前面提到的赫尔摩特外，另一位的中国名字叫卫德明，他曾编写过一本《德华词典》。当今年纪较大的德语工作者都曾使用过这本工具书。他们都可谓子承父业，都成为了了不起的汉学家。可是卫礼贤伟大事业的继承人，并不只是他的儿子。当今德国汉学界，卫礼贤的景仰者如雨后春笋，他们都以卫礼贤的学生自诩，他们在当代中德文化交流中都做出了很大成绩。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领导汉学研究机构和大学里汉学系的都是一些年迈的老教授，他们长期研究儒学和汉唐等古代文化，某些领域例如《易经》的学术著作几乎赶上中国，甚至有人说，超过了中国，他们作为卫礼贤的后继人，推崇东方文化，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理

当赞许，但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熟与遥遥领先的诸多因素中，从玄学到玄学，钻进了死胡同里，有人认为，这批学者似乎有点僵化了。殊不知卫礼贤刻苦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在他那个时代似乎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当时仍占统治地位，后来则是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当然，这里也应指出，在卫礼贤第一次离开中国时（1920年），中国已在一年前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仍然埋头于故纸堆中，这除了受青岛老人们——清廷遗老们的影响外，也说明卫礼贤虽曾批评孔子的好古、守旧、保守，但他自己也钻进了这个死胡同。即使目前在德国，也还有一些高校汉学系的教学内容仍以古汉学为主，大学生毕业后多数改行，这除了社会制度等原因外，所学的古代经典的确难以致用。多年来，极少汉语毕业生从事与汉语有关的业务。在某些地方，即使有一些从事现代文学的学者似乎也没有市场，好像只有钻研古代文化，才显得高深莫测。就全德而言，这种气氛在较多地方已引起一些中青年汉学家的关注与强烈不满。德国汉学界可说是面临一场变革，他们大声疾呼，要把目光投射到现代中国社会，把迷惘不知其所以然的年青一代大学生从经学玄学中解救出来。他们的进步行动已取得显著成绩，这当然有赖于中国的沧桑巨变。例如在汉堡大学汉学系虽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但已渗进了新的文学内容。高校的另一情况，例如博鸿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汉学系早就强调以现代中国文学为主。在目前德国已有不少中青年汉学家，翻译家致力于翻译和研究鲁迅、茅盾和巴金的著作。近年，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到欧洲的已越来越多了。王蒙、张洁、王安忆、张抗抗等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广东

省作家陈国凯的《无题小说》、《主与仆》也已译成德文。广东省作家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普通女工》、《追求》、《电话号码 23450》也被翻译介绍。^⑩ 目前，德国汉学界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已有了很多新的计划与措施。过去中德文学交流上的逆差已开始有了改变。显然，这一切与卫礼贤早年率先所做的事业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现状应当看作是卫礼贤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人们为了纪念和缅怀卫礼贤的功绩，联邦德国设立了“卫礼贤翻译文学奖”，以奖励那些中国文学翻译者，推动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第一位因成功地翻译了张洁的有伤痕文学余波，反映企业要腾飞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而获得头等奖的年轻汉学家，就是现北京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先生。^⑪

卫礼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理应载入史册，他的功绩不可低估，他是“中学西播”的杰出工作者，在弘扬中国古代文化方面功勋卓著，人们应当永远缅怀这位大汉学家，为我们今天和未来的欣欣向荣的中德文化交流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

①②③⑥⑧参阅沃尔夫冈·鲍尔为《卫礼贤，两个文化世界的使者》所写的前言：

④⑤参阅陈铨《中德文化研究》第136页和第56页。

⑦参阅W·F·奥托为萨罗美·威廉《理查德·威廉，中国和欧洲的中间人》写的前言。

⑨⑪参阅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人民日报》国际专页，1990年2月22日。

⑩见孔捷生《欧行鳞爪》，《作家通讯》1985年第四期，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库恩和中国古典小说

林 笏

—

弗朗茨·库恩（1884. 3. 10—1961. 1. 22）是德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的弗朗肯贝格，1903年中学毕业，赴莱比锡学习法律，次年冬转柏林学习汉学，两年后返莱比锡继续攻读法律，1908年通过国家考试，获律师营业执照。1909年被派到中国任驻华公使的翻译。1912年，库恩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回到德国，从师于汉学教授约翰·雅可布·玛利亚·德·格洛特。格洛特教授精通中国的宗教、哲学和历史。在他的指导下，库恩完成了第一篇汉学论文《崔实的政论》（1914），其后还写过有关中国君主政体的文章。但是，库恩没有继续追随他的导师从事汉学研究。他感到，当时西方流行的许多关于中国的书，是一些戴有色眼镜的欧洲人写的。要介绍中国，最好是“让中国的作者说话”。而与通篇注疏的四书五经相比，文学作品对于广大读者具有更大魅力。于是，他独辟蹊径，走上了翻译中国小说的道路。

综观库恩的翻译生涯，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1919年至1926年，是他从事文学翻译的初期，主要译短篇的寓言和故事。处女作《卖油郎与花皇后》（即《今古奇观》中的故事“卖油郎独占花魁”）发表于1919年，是参考法译本翻译的。